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痛定思痛】	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樊思清
【追根溯源】	为什么毛泽东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 发动与推进“文革”	王 毅
【铁窗生涯】	狱中杂记（中）	马云龙
【劫后反思】	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读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有感	唐 燕
【编者启事】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痛定思痛】

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 樊思清 ·

我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家搬到南京。小学时我在南京，中学时代在武汉。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部部聘高工，母亲是小学教师。当时南京鼓楼小学里没有幼儿园，1950·9开学，母亲就把我“放”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上，我“花费”四年，读了2年小学一年级，2年小学二年级，才许我正常升级。初中保送高中，高中全科成绩优秀，体育成绩有特长，年级数、理竞赛拿过第一，一九六四年我考入清华大学。

家庭精心养育十八年的长子，在清华武斗三个月消费殆尽，一秒钟负债累累。

一、武斗，三个月铸成终身遗憾；杀人，一秒钟改变两人命运

1968年4月23日旧电机馆发生了武斗，当时我从二校门回2号楼经过了现场，在那儿驻足了两三分钟，看见我们系也有同学在那儿打得正欢，当时我还在想：“有什么说不好的事情不能解决？非要打这么厉害，非要武斗呢？”后来才知道清华的“百日武斗”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其实，我在1968年4月25日就已经打算回武汉了。我把行李都集中在一个箱子里面，运送到我（北航1964级一系的）中学同学那里。后来，因为没有及时地买到火车票，所以我就没有离京回汉。我回到学校以后看见两派的武斗升级了，那时既然没有回家回武汉，就鬼使神差地留在了学校，参加了团派很多活动。

记得在清华大学414和团派之间“交换俘虏”的那天，双方进行“俘虏交换”之前还保持住了各自的阵形。我在团派的队伍这边，手里拿着一根长矛，充当着414俘虏的“护卫”。正式“交换俘虏”的时候，现场双方的气氛好像还比较正常祥和。可是刚刚把俘虏交换（受伤的先被抬走）完毕，双方各自就带着各自的队伍散开并且缩回据点，场面气氛即刻恢复武斗的状态——极度紧张和敌对！

此时，我和护卫俘虏的其它几个团派同学，背靠二校门清华老邮局，躲在其西北角。突然有一根长矛，从清华老邮局里面，刺破窗户玻璃，直接扎到我的后腰正中间，至今后腰上还有一个矛尖疤痕的印记。幸亏当天，我配带着“牛皮护腰”（举重用腰带）。由于我练过举重双腿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当对方双手双臂全力把长矛推送到我背后的时候，我只向前踉跄了两步而并没有跌倒。因为那毕竟只有一个人的“质量”，刺破的玻璃也起到了“消减”作用。晃过神来当我回过头再去堵邮局的大门，已不见“刺客”人影。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伤，回去以后解开腰带才知道背后有血。如今我想：“您用长矛扎我，若见到此文会有何感想？为什么下手不重一点！哪怕让我住院几个月……”历史没有如果！

当天我已经手持长矛参与了团派的群体活动，“手持长矛”的形象业已暴露在清华园的众目睽睽之下了（当时清华园里围观的师生员工和居民有几百人）。

武斗期间我的父亲正好上北京来出差，就住在北京东交民巷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礼拜天他到清华来看我，正好赶上许恭生和段洪水的追悼会。当时在1968·5·30武斗中许恭生被414的众同学用长矛刺死。许恭生被刺也是因为是在5·30武斗之前414武斗战士留在脑子里的复仇情绪使然。段洪水从攻楼的梯子上面摔下来致死。我还记得在追悼会上许恭生的妹妹作了“控诉414的罪行”的发言，这激起了我心中对414的愤怒。当时我的父亲也经历了这个追悼会的全过程。父亲虽然当场劝我同他一起回武汉，回家，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决定。我还是留在北京，留在了学校里。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没有对我母亲说过这些事（我和父亲在北京都参加了许恭生、段洪水追悼会的事情，以及我在北京参与清华大学武斗的事情）。

此后我不断地，进一步参与了团派的群体活动，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有参与者的情绪亢奋，且呈正反馈影响中（同一派的互相怂恿，对立派的积恨成仇）！此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派别团体活动有“群体裹挟效应”。1966年下半年以来，我的政治立场，已经完全的站在了团派这一边。但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是仅仅停留在观点上面。

今天回过头来认真思考，文革期间各种理论对自己影响最大，能够算得上引导我走向犯罪的洗脑效果，就是始作俑者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两派群众比喻成国、共两党在斗争。江青又叫嚷“文攻武卫”，为武斗背书。她还提出：当前文化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应当大量武装左派。这对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虽然文革进行中双方还是同学（如反右鸣放初期相互之间还是同学一样），还不像是“国共双方”，可越是接近秋后算账之日，也和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关系没啥区别了。我很真切地感受到虽然“文革”属于“人为制造”，可“秋账算后”其你死我活的仇恨将会真真切切闪烁在仇人的目光里！

老团广播台里不断广播着有关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消息，使他成了我的偶像。找到了搞革命就一定不能够放弃武装斗争的例证，对我有很强的刺激。以上是参加武斗前后，那些“人造阶级斗争理论”对我思想产生的影响。

我记得我是在1968年5月30号左右进驻大礼堂的，之前我住在一号楼的4楼。我进驻大礼堂的时候，除了我们系的几个人以外，还有一个石油学院的理论家（他的父亲是一

位历史学家)。在两个来月的武斗全过程中，他一直驻守在大礼堂并且给我们“上政治形势课”，讲解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时我一直认为他是团派总部派过来的。说实在的，石油学院的理论家关于“文革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必然要发展到武斗阶段”的理论，以及“党中央就要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可能会作出什么决议”，等等，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对当时的我影响极大，也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68年6月30日，当我正在礼堂里面吃饭的时候，在大礼堂和新水利馆之间传来了爆炸声。我们放下饭碗赶出去一看，有几个团派的同学在抢救和搬运我们的伤员。原来是414的人从清华大学东区突破我们的包围（沿着大礼堂北边的那条小河的南岸），左拐弯跑到新水利馆和大礼堂之间时，遇到了团派的同学，于是他们扔出了手榴弹。团派同学，一个人的腿骨被炸断了，另外一个腹部进了弹片受重伤。而后这一帮414的同学就跑进了科学馆。

于是我们加强了警戒，当天我就带人进入新水利馆（包括某档案室），巡查了两个多小时。确认“的确没有414的武斗人员潜伏在新水利馆里面”而消除了“侧翼的隐患”以后，才放心回大礼堂。

我们大礼堂守区很快就接到了蒯大富的命令，命令要求我们包围和封锁科学馆，直到414方面交出凶手和肇事人员，不放一个人“出”或“入”！凡有出入科学馆者格杀勿论。蒯大富的命令渲染和强化了“包围科学馆，困住414的武斗人员”的紧张气氛。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大礼堂的管辖区）“闻亭”上用沙袋草包构建了掩体和工事。团派当时的“洋枪队”为我们配备了半自动步枪，子弹和探照灯。我们分班日夜值守，严防414的人突围。当时在现场和我一同值班的还有动力系的实验员某某和一个中学生，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值班小组。

1968年7月4日凌晨，我和动力系的实验员某某加上一个中学生，三个人正在向科学馆方向观察（距离很近，一共65米），中学生突然小声说：“有人突围！”我立刻拿起枪对准黑影就扣动了扳机。某某说：“人倒下了！”“还有人要突围出来，趴下别动，把探照灯对好”。

从被害人出来，到开枪，到被害人倒下，一共就十秒钟左右。

我们趴下没动，又观察了一阵子，没看见有什么动静。我开始害怕了，对他们说：“人怎么躺在地上不动了？快把探照灯关了！有人出来救，就再不要开枪了，让他们把人救进去”！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和害怕，大脑一片空白。我对他们两个说：“我回大礼堂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

于是乎我回到大礼堂，这时候蒯大富打电话来问，是我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黑胖子（当时在武斗期间他们都叫我“黑胖子”）。”蒯大富问我：“刚才是不是大礼堂那边打的枪？”由于非常害怕和紧张，我回答蒯大富：“我不知道啊！”又过了几分钟，我就听见在清华的好几个武斗据点传来了枪声。事后才听说这是蒯大富下的命令，用其他的枪声来掩盖我这一枪，企图造成“众枪声责任分散效应”（与“众长矛责任分担效应”道理相似）。密集的枪声哄抬了武斗的紧张气氛，加剧了对立情绪！“群体裹挟效应”再施魔法，使得第二天7月5日胡Y开枪打死了科学馆里的杨ZJ。科学馆里一百多人被困在极度的悲愤和恐惧中。

我曾经在监狱里对胡 Y 说，我在 7 月 4 号开枪以前和以后的情绪大不一样，我开枪以后很快就害怕了。胡 Y 回答我说：“我也是。在 7 月 5 号开枪以前想的就是——要包围科学馆，不放人出来，没想太多。可是在开枪以后，也很快就感觉害怕了。”后来我想：真正胆大的还是蒯，一直不怕。他的胆是谁给的？

在此，我愿跪在（被困科学馆以及在动农馆积极实施救援的）众人的面前作忏悔！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不再作恶。

说起我开枪以后躲在大礼堂里和蒯大富通电话的事情，还有一件相关的事。

在“工宣队和军宣队”开进学校以后，两派的同学坐在一起说起武斗，我们系里面 4 1 4 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开枪以后老蒯打电话问你，是哪个方向开的枪？是谁开的枪？你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和老蒯之间的这段通话，被我们录了音，留下了证据。”“我们 4 1 4 的录音对你有利，说明你开了枪以后并没有立刻向蒯大富去邀功”。咋一听到此话，我即刻发愣了！当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心里才想：怕都来不及呢！还去邀功？“旁观者”和“当事人”的想法的确大相径庭啊！旁观者可发奇想，随意推断。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事后所发挥的“穷尽想象力”和“无穷尽推断力”不可小觑。我与蒯的电话内容呈现出了“当事人本人的罪恶感”，而当事人的同伙也具有“连带罪恶感”或“怕被牵连感”。其表现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感觉到，大礼堂的同伙已经怕我，回避我，不理我了！也根本就没有人拿我当英雄对待，去蒯那里“报功”“庆功”。日后有多次，我自己还在内心赌气地想：参加武斗的人难道同当年“日本鬼子”一样穷凶极恶吗！？

我一直在大礼堂内惶恐不安，天就差不多快亮了，我又跑回闻亭，面向开枪的方向看。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在慌张之余，看见科学馆里面有 4 1 4 的同学出来把朱玉生抬了进去。我只瞥了一眼就赶快回头不敢再看，心里害怕情绪紧张到了极点，又独自一人回到大礼堂去了。大礼堂内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人，谁也不来陪我一下。这一点印象太深，太强烈！当时我就想不通其原因何在？

记得接下来的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抽了几包烟，很少和其他人说话。大礼堂的人见了我也不主动搭话，整个大礼堂的气氛好像突然沉闷起来了。第二天自己一人回到一号楼，独自一口气喝进去整整一瓶烈性酒“二锅头”，没有任何食物下酒，全是空喝，也没有喝醉，只是感觉身体有一阵子轻飘飘的。

此时虽然命案在身，可是心里想的还是“包围科学馆，不放一个人出来”，所以有人（赵德胜）“事发”后出逃内蒙古，而我没有。1968年7月27日以前我一直值守在大礼堂。记得事发后几天，我还听见郭仁宽学友从动农馆大喇叭直接点着我的姓名喊话，现在想起来感觉到恐怕与上面那个录音有关。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员进清华，队伍开到了老图书馆和大礼堂旁边的時候，对我们喊话，要我们放下武器。由于我自己背负着“打死人”的思想负担，当时比较顺从，而且我开枪杀人的事件发生后，整个大礼堂守卫人员的情绪都比较沉闷，说明大家心里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就一致采取了“放弃抵抗”的态度。这时我“无形间”就把大礼堂东边，靠近河边的那个门打开了。守卫大礼堂的“我的几个同伙”似乎也怀着和我同样的“内疚”，没有抵抗就让工人师傅和解放军进入大礼堂。我的负罪感对大礼堂区包围圈的和平瓦解起了催化作用。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入大礼堂这个百日武斗的主战区，宣告了包围圈的解体。

接着，工宣队军宣队便顺利地接近和进入了科学馆。科学馆里的同学看见了大礼堂顶部已经有解放军在拆除“大皮弹弓和高音喇叭”。

大礼堂是我们认为“团派最坚固的堡垒”，里面存有两个月的食物、水、燃料，只要关住了门，不付出巨大代价是不会被攻破的。事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是后怕并庆幸自己：幸亏当天没有任何一个人企图倚仗着大礼堂这个“最坚固的堡垒”，对工宣队军宣队进行殊死抵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礼堂内有半自动步枪，有制高点。我想，应该是负罪心理瓦解了我们内心的张狂吧？

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师傅把我们驻守大礼堂的几个人隔开，分别询问情况。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参加武斗的学生，如实地说了我自己的姓名，是哪个系哪个班的……当我正在大礼堂里面回答解放军向我提出的问题时，听见大礼堂和新水利馆之间（道路）的方向——“砰！的一声巨响！”我想赶紧跑出去看，但是解放军和工人师傅不让我出去。正在这时，听见外面有一个工人师傅进来报告说：“刚才手榴弹爆炸，有一个女师傅（后来才知道是针织总厂的革委会委员）屁股被炸成重伤，还有一个军宣队员（后来才知道是针织总厂的军代表）后腰被炸伤。”这个时候那个军宣队员对我严肃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现在应该做的是马上交出你们手里参加武斗的所有武器。”

我自己心虚，经过几番盘问，只好对他们交代：“我们的枪放在大礼堂的储藏室里面。”我们带着工人师傅找到了大礼堂储藏室的门，让他们进入把武器拿了出来。当时我当然不敢说自己有开枪打死了人的事，只说了自己是参加武斗的学生。那个解放军和工人师傅看见我比较配合，把武器抄出来了以后就放我走了（2016年后才知道是工宣队按计划撤离）。我回到了一号楼，才从其他据点撤回来的同学的口里得知蒯大富总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当天下午还是晚上，我又进入了礼堂区域，发现在“闻亭”那里的山坡上，工事的两个大石头中间，还有一把土制的“火桶子枪”和一个手榴弹。我把这两个武器拿了以后，就按照总部的“撤退命令”，撤退了。我在撤退时路过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就把手榴弹和土制的“火桶子枪”扔进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里。之后，跑到一个团派北京同学的家里躲避去了。

在1968年11月中旬，在追查枪支和手榴弹的过程中，我交代了在撤退前把手榴弹和枪支扔进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里的事情。这时冬天已经开始，工宣队的师傅要我跳入那条小河去打捞丢弃的枪支和手榴弹。经过几十分钟的“触摸”，万幸的是两件武器都被我捞起来了。我记得河面结有薄冰早上很冷，工宣队的师傅同意我下午再去打捞，再喝一点酒暖和点。说实在的，我当时只感觉心里紧张，只想把东西赶快捞出来，根本没有觉得很冷，直到现在也记不起当时有冷的感觉。只过了几分钟枪就被我“触碰到”并且捞出来了，赶紧把枪扔上岸。手榴弹可不好找，余下的时间都在找手榴弹。用脚触碰到了，再用手确认后，兴奋不已！小心翼翼地拿出水面（这回可不能“扔上岸”），走上岸，岸上的人比我紧张多了。直到我把手榴弹主动放在地面上，十几秒钟以后他们才拢过来。

为了交代以上开枪杀人前后的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也记不清写过了多少回？交了多少次？包括向工宣队交代的，也包括在司法机关里面，我向司法人员交代的，以及在后来的劳动改造岁月里自己所经常“自我批判”时说起的。这些都记录和保存在我的档案里。

我记得是1968年的8月8日，我主动找工宣队的师傅，首次坦白交代的自己的罪行。以后我又写过和回忆过无数次与武斗相关的事情。

后来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迟群和谢静宜，组织过全校的师生员工对武斗作清算批判大会。全校各个系都有分会场，我被安排在主会场，主会场在大礼堂前面。开会进行中，会上有人曾经当面向蒯大富提问：“在闻亭的开枪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蒯大富毫不含糊地说：“是我下的命令。”蒯大富的回答，我终身难忘。实际上蒯大富的命令是很笼统的。

二、我的忏悔词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到了。我愿跪在朱玉生同学面前，向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中被我打死的您作忏悔！再次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不再作恶。

我是“三种人”里面的一种人，不够资格做几个代表。

在此我谨代表我的忏悔之心发愿：除恶业清劣迹！向受害者赔罪，跪在地上请求恕罪！

一切我今皆忏悔！愿忏悔使我身心轻安，灵智得以解脱。尽管已经受过刑事处分，但那仅仅行进了“一小半路程”，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世界之大，不管属于哪一种人，罪灭障除，方可进功修行。“文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众生祈求悟真，以免难消灾，仅防其重演。

罪人：樊思清 2016·4·4 00:00:10

三、我的忏悔观

在忏悔进行中反复思考，形成了我关于忏悔的总的根本的观点，表述如下：

（一）忏悔的前提

犯罪人应该要求自己：必先揭露真相厘清事实廓清原本，才有忏悔。
充分揭露真相认真厘清事实廓清事件原本，忏悔方现真谛。
罪恶既已充分披露牢牢绑定，“普世俱忏悔，随遇而忏悔”方能进功修行。

（二）忏悔的独立性

是属于个人心理层面的活动，是一种内省的方式，他在人格上应该是独立进行的，只能自己独立全盘承受，不需要示范，不需要胁从，也不需要被认同。

朱玉生被我杀害多年后，尽管并没有“专政机器”天天逼我，我却通过独立内省，使自己从“精神上的恐惧”转变到“灵魂内的不安”，跨越了一个层面。

（三）忏悔必将心比心，划断昔今

必须“将对方之心，比自己之心”，是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对话；
忏悔，是以“目前的我”，来审视、批判和解剖“过去的我”。

（四）如何看待自己？由此我作了简略假设：“假设自己已经被枪毙过一回”，作了前后两个阶段“昔今两个我”的区分。“今我”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审视、批判和解析“昔我”，一切才会更加明朗清晰。

（五）忏悔应不计得失

是无条件的，它容不得任何“借口”，不允许“戴任何面具”。

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既然不杀我，我必自觉划断过去；赤条条地重新来过！岂容任何“借”，“戴”。

（六）忏悔，不可能改变罪恶的原本

牢记：过去的罪恶已定格成为历史，那个我已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七）忏悔的底线，是“不二过”或“后不再造”

忏悔过后又重新作恶，那还叫“忏悔”吗！

（八）忏悔，不拘形式，不拘时空，一般也不拘场合

无论选择欧美式《牛虻》的内省忏悔，还是选择俄国式《复活》的公开忏悔，内外不拘，皆可忏悔；

不管是心念佛陀以清障蔽，还是祈祷圣灵如何使人悔改成圣，教仰无类。

（九）忏悔的终极形态

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最后的“最真实的状态”？

“不能自拔”，“无法解脱”，“自强自担”应该是忏悔的最后正常状态；忏悔只有起始状态（起点），没有最后状态（终点）。

很多人忏悔到“不能自拔，无法解脱”之时，或心念“陀佛”，或祷告“耶稣”，或跪求“真主”（推给神灵）以抚平自己的内心，求得解脱！盖源于此。

而我独感悟：“终极的问责”令人“不能自拔”，“无法解脱”时，不要试图推给神灵，而应“自强自担”苦果，直至人性复归！

我选择直接跪求朱玉生同学！心念朱玉生的父母兄弟！向天下的父母祷告！

“他来之手”偶遇而不求——有没有“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都不是忏悔者所应考虑到的。

（十）忏悔的威慑力

忏悔的“自强自担”的“最后状态”是对作恶者的最大的威慑。

任何人只要敢于作恶，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忏悔，不会终结！

（十一）忏悔的相对性

施害者在某种意义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也是受害者；受害者某个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有过加害行为；也可能会有忏悔的愿望。

具有相对性，因此可换位思考。

（十二）忏悔的反身性

受害者在一定情况下，还没有来得及对施害者提出责任要求时，施害者越是应该主动及时忏悔，否则良心负担会越发沉重。

具有反身性，因此对责任主体的谴责暂时缺位时，忏悔主动回补更显必要。

（十三）为求和解，对悔悟者的忏悔在时间上允许暂时（与真相披露）相错配。

施害方停止施害，表示认错，幡然悔悟，但一时未能完全彻底公开施害事实时，受害方可先等待真相逐步披露，而不一味苛求“施害事实必先彻底廓清才许认罪”。受害方的等待，显示睿智，暗示宽容大度，反而有利于事实的彻底揭开，甚至会揭露出藏匿于后的真凶。真相披露和认罪忏悔两者不可能完全重合。暂缓苛求，宽容时间之错配，往往会奏出和解序曲的谐振之音。

我犯罪48年以来，回归社会35年后，已不再作恶，所以我取得了“一直忏悔下去”的资格。那么我还将继续忏悔下去，让忏悔与生命一同终止：

（1）即便对于自己，忏悔的缠绕时刻存在，相信忏悔会再次使我内心平静；

（2）即使无人理会或是有人挑剔，也选择把忏悔的纠结埋在心底让她继续。

清华大学动力系零字班樊思清

2016·4·18 01:12

忏悔本来只待 静默悄悄进行

时代列车 永远行进，

大众反思 正在进行；

受害者 揭杆而起！

施害者 确在分化：

主动 独立忏悔？

被动 胁从道歉？

无动 于衷？

身心 均不安宁，

逍遥者 尚未觉醒。

我愿主动 独立忏悔，

谢启蒙者 愿者继续。

启蒙者说 去做吧：

没做过的 叫成长，

不愿做的 叫改变，

不敢做的 叫突破。

你向 上帝求助，

你 相信上帝；

上帝 没有回应，
主 相信你。

启蒙者 不是上帝，
她是你 命中贵人；
只要你 突破自己。

忏悔过程 纵然痛苦，
每次解脱 祈幸于心，
知耻成勇 灵智宽息。

樊思清写于 2 0 1 6 • 5 • 9 0 0 : 3 0

把自己的忏悔和别人的段子相结合，牵强垒砌、排列出的“造句”；
以强化和记住《直面我失落的人性》落稿后的“解脱感”。
自意自解：揭（笔）杆而起，不是揭竿而起。“造句”里一共有五个“者”。
施害者，在“同时也受害”的意义上也应该揭杆而起。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 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 0 1 8 年 5 月

~~~~~

#### 【追根溯源】

为什么毛泽东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发动与推进“文革”  
——皇权政体的结构与机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具体例子

• 王 毅 •

- 一、“中央文革”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 二、“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与政治功能
  - 三、“中央文革”与中国皇权政体
- 结语：“百代皆行秦政法”的根源在于权力制度结构及其法理逻辑

以 1 9 6 6 年《5 • 1 6 通知》为始的“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江青等人为首、戚本禹等为骨干的“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之一。这不仅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进“文革”的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对许多今人来说，“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成方式与政治行为方式，可能非常不易理解：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多数人资历很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口悬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无数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也取代了国家常规的最高权力机构而成为权力中心与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并且在对各种政敌施以疯狂打击的同时，又在一轮接一轮永不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 1 9 6 8 年 1 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报告中说：

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1）

读着这段文字，人们多半要问：“文革”为何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 一、“中央文革”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中央文革”从登上历史舞台到其权力急剧膨胀、再到其恶贯满盈，众多成员无一例外身败名裂的过程，典型地表现出“文革”时高层权力运作的特点。这套运作的大致过程是：

1964年5、6月间，在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之际，根据他的指示，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中共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1966年2月3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讨论，至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共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5日将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表示同意。8日，彭真、康生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说明”〔2〕）。12日，彭真、康生等到上海，将《汇报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汇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但是不久，这份文件即被身为党主席的毛泽东斥责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运作相对的，则是一套非常隐秘的操作：早在1965年，毛泽东就背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秘密方式将文章初稿带到北京反复修改，然后在上海发表。1966年3月下旬，康生借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协助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话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而毛泽东则说：再不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

3月31日，自上海回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28至30日的连续三次讲话，这些讲话毫不掩饰他对于党和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威严处置：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至此，“文革”第一批受难者的任何辩白与乞怜都不能改变其命运了——据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记述，这时的彭真还希望能向毛泽东当面申述，哪怕只有20分钟，但已经根本不被理睬。

同时，引爆“文革”的程序正式启动：康生在1966年3月底向北京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汇报提纲》作废。文件写成后被毛泽东认为太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外写一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件。陈伯达与王力共同起草后，送毛泽东审定。在此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其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4月16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举行，毛泽东不仅没有到会，而且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他亲自对《5·16通知》草稿反复修改，然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只能被迫接受《5·16通知》，并作为“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公布。

即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仍可以深切感受到那些受难者被推上祭坛时的哀怨：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80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

者包括非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而当时健在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约160人），以这种非常程序强行通过《5·16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在此最后关头，向刘少奇、周恩来提出删除《5·16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句矛头暗指刘少奇的话，但已经不可能（彭真在“文革”后说，他当时即已觉察到“赫鲁晓夫”不是指自己，是指更高位者）。康生表示：毛泽东改定的《5·16通知》文本一个字也不能动，所以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而被断然拒绝后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4〕

如此图穷匕见的情形下，“中央文革小组”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组”基础上于5月28日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在“文革”初的5月至12月期间，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但是在1967年1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执掌的“中央文革”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运作。接着，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完全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

其实，早在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召集的中央常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已经把自己通过“中央文革”而反击刘少奇等人控制常规国家体制的意图表达得十分清楚，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他甚至用这样的语言表达对中央书记处等的强烈敌意和对“中央文革”的称颂：“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5〕

以后，中共八届十二次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更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的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会《公报》接着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这当然是联袂并举的一破与一立。所以直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于后！

## 二、“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与政治功能

不难看出：“中央文革”特殊的产生方式和成员构成，成因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要通过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一套国家常规权力体制贯彻强化、而他本人意志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抑制的强烈愤懑，以及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危险的警惕。所以在“文革”以前很久他就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多次说北京的空气不好，说自己不读《人民日报》；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暗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文革”前他长时间远离北京，甚至“重上井冈山”，酝酿“以

农村包围城市”。因此，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所以后来他“文革”战略的首要目的，就是“炮打司令部”。

为摧毁常规权力体制，毛泽东必须造就一个与此战略目的相适应、得力而强大的政治工具；他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而这些“小鬼”的必备条件是：

1、必须处于毛泽东直接与完全驾御之下，绝对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即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2、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权力欲望与攻击性，以便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

3、与前项相对应，其政治行为必须与生俱来地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

4、他们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及时在舆论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总而言之，“中央文革”的一切恶行，主要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羸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个人恩怨所决定，而是出于政治制度结构和运作的一种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秘书而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合作化运动中，负责农业的一些领导人被他认为是拖后腿的“小脚女人”，所以他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中予以严厉批评，研究者注意到：“这篇讲话是在他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它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的官员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6〕

而为了保证通过秘书进行政治运作的有效性，毛泽东对秘书的基本要求是：他们绝对不能被国家和党的常规权力体制所控制。比如据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何载追述，他50年代在杨尚昆领导下就任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这期间他的一次经历是：

（1956年某次毛泽东身体不适时）我得到了电话通知，要适当减少给他送阅的东西。我……向有关办公室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史例。我简直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7〕

可见毛泽东对“封锁国君”的深恶痛绝。更加怵目惊心的例子又比如：田家英在1966年5月被逼死之后，毛泽东任命戚本禹取而代之，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戚本禹后来追述：

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8〕

仅仅从毛泽东（以及他通过江青）所指称的“封锁国君”、“结交诸侯”这类语词、以及他对此类危险的极度警惕，马上就可以知道：从1956年直至“中央文革小组”的上述政治操作方式，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历史渊源与历史逻辑。

### 三、“中央文革”与中国皇权政体

“文革”之后的1979年，中共元老李维汉对孙起孟说：我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在我心头放不下，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对它的成因非搞清楚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

次年5月24日，李维汉会见邓小平时又郑重陈述：我多日来就想与您谈一个大问题，就是封建主义传统问题。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很厉害……（9）

李维汉所说的“封建余毒”，其实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君主集权政体及其文化形态”，因为周代的“封建制”至秦即不复存在，其后两千多年实施的主要是秦始皇所确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皇权统治（见《史记·秦本纪》）；这两千年历史留下的也不仅是一些显性化的思想和风俗，更主要的是一整套刚性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法理、法律规则。这些传承脉络往往会像海面下的冰山那样不易被察觉，但实际上体量巨大、结构缜密、其运行必然导致骇人的结果。比如毛泽东认定自己所面对的巨大危险在于国家体制运作造成的“独立王国”掌握了权力并“封锁国君”；而为了粉碎这种局面，就要启用一批“小鬼”以打到“阎王”、“炮打司令部”——正是这种迫切需要，才使得“中央文革”应运而生并迅速攫取了巨大权力。

秦汉以后，皇权与国家行政体系之间既相互依存，但同时也相互矛盾、间或激烈冲突。这就是主张君权至上的法家所深恶痛绝却又反复出现的状况：“览观古今，爰暨书传，君皆欲治，臣恒乐乱”（10）；以及明太祖朱元璋一再愤愤然的：“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11）；“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张君之恶，邪谋党比，几无暇时！”（12）

因此在这种矛盾结构中如何维系君权的至高无上，就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权力体系长期发展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逻辑线索。其演进的基本轨迹在于：在必须建立庞大国家常规行政制度、赋予它巨大权力的同时，又必须能够克服它对君主的束缚、保证君主的个人专权。

秦汉以后统一皇权国家的建立，要求相应地建立和运行庞大的官制体系，即以宰相为首、序列百官的常规性国家行政架构，它是国家政治有序化的保证。但是庞大完整的常规官制架构之有效运作，又必然与君权独专的要求产生严重冲突，而这又要引起君权对国家权力体系的反抑制。而从根本上说，君权的反抑制不能仅靠君主个人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而实现，因为这种方式的效力有限且不具备权力合法性。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必须发明出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强力手段；而如此制度设置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断在常规行政体制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亲幸的政治班底，由它直接协助皇帝个人垄断国家最高权力与最高机密，并同时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施以强大的反抑制。

上述规律在中国制度史中表现很明显：汉代常规官制体系原本是由以宰相（“三公”）为首的外朝百官组成，皇帝身边的人员只负责生活服务而不具备政治权力。但是汉武帝感到这种制度不适应君权充分控御的朝政的需要，于是为了强化皇权并抑制宰相公卿的权力，他

就在常规官制之中强行楔入“加官”制度〔13〕，即亲自提拔一些出身较低、富于才干的官吏超越正常的选拔程序，成为“出入禁门”的“腹心之臣”〔14〕，并让他们越过外朝百官的层层制约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协助制定政治方案；同时任用原本地位很低、只是负责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充当自己身边掌握国家政治机密的谋臣。

以后，这种政治设计充分制度化：在汉代，尚书（他们通常是皇帝的亲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仅越来越高、而且极大地侵夺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层首长的权力。至东汉，“尚书台”已是实际上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而原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则被架空；至魏晋，尚书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的国家宰相，而三公则成了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荣衔。这个演变方向说明：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专权（即“秦制”确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原则）远远不仅是君主个人的主观意志，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它还必然演化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权力运行程序和具体有效的制度架构。

中国皇权史的发展多次重复上述规律。例如：当尚书在魏晋时代取代三公而成为外朝百官首长的同时，皇帝已经不允许其身兼内朝和外朝的权力，于是剥夺了原属尚书郎（尚书的属官）起草诏书的权力，改由以前仅为宫廷小臣的“中书”负责起草诏书，而尚书仅负责诏书的执行。由于“中书”是直接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宣达上谕的文士，所以其部门首长（中书令）很快同尚书令一样，于名于实都成为了朝廷百官的首脑〔15〕。

而当上述制度确立后，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们又需要再次启用新的出身微寒、富于政治进攻性的文人学士作为自己半秘密和负责起草诏书的政治秘书班底，并赋予其惊人巨大的权力，以便与制度化的庞大官制体系相抗衡，从而保证皇帝专权的充分实现。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政治秘书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直接被称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16〕，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军机处”。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人作为“天子私人”并组建“学士院”、进而任用这些恩幸者作为“专掌内命”、控御朝政的工具，这类制度设置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体系“封锁国君”的可能，但它并不能杜绝制度体系中相应而来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例如南朝时，皇帝出于戒备宰相等外朝众官的目的而让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侍奉于自己身边的几个恩幸文士小臣（“中书舍人”）手里，结果是这些恩幸文士的“鼠凭社贵”极大激化了权力体系中的矛盾冲突，导致国家政治迅速沦入灾难的深渊，即如史学著作所沉痛描写的：

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戮！〔17〕

然而因为离开这种手段君权无法抑制国家官僚体制“封锁国君”的趋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国君”就只能重蹈这千年未变的悲剧。

回顾历史就能知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其实无一不是对历史上那种非常成熟的政治组织架构（“天子私人”）的承袭不改。再举北魏的例子：魏庄帝忌恨大将军尔朱荣权势过大，于是秘密布置诛杀他的计划，并由近侍文人“中书舍人”温子升等人参与密谋、起草有关诛讨的文檄。当温子升手持诛讨尔朱荣的诏书出宫时，恰遇到尔朱荣入宫。尔朱荣拿过诏书问道：“写的什么内容？”温子升应答时神色不变，丝毫未引起对方怀疑，所以尔朱荣并未打开文件细看，遂毫无戒备地入宫受死。〔18〕

诸如此类史不绝书的经典故事，当然与1965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机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一脉相承则说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确立的政治体制，是如何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两千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面目。

◇ 结语：“百代皆行秦政法”的根源在于权力制度结构及其法理逻辑

早如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在总结历代治乱时就指出：皇帝“信小臣而疑大臣”的结果，必然是这些恩幸小臣借机“舞文弄法”、“谄诈萌生”〔19〕；元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制度学家马端临也曾喟叹与困惑：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乱臣贼子”，总是能够利用皇帝与外朝常规体制相对抗的机会而成为“天子私人”，同时又总是能在这种抗衡中用各种阴谋手段攫取巨大的权力？〔20〕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皇权制度的深层机理，就可以知道：上述这一切，都是其权力结构与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

总之，如同笔者反复指出的，“秦制”以及“百代皆行秦政法”（毛泽东语）对于中国的影响，远不仅是表浅地体现为观念与思想的呈现、传承——比如人们经常说的“帝王思想”、“官本位思想”、“国民性”等等；更主要也更为深刻的，乃在于其权力制度大厦从巨到细的结构方式、其权力体系的法理逻辑及其运行过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制度结构与制度法理决定着无数惊心动魄历史症结与历史事件的具体面目，决定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价值坐标与伦理取向〔21〕。而本文介绍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原因、其政治行为方式等等，则是这个决定作用的又一具体实例。

（2016年5月“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删节一篇旧日长文、并补充新见史料而写成本文。）

〔作者简介：王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退休。〕

注释：

1 引自南京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编印：《读报手册》（1969年版）第290页“中央文革”条。

2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版，第12页；王毅注：本文中的黑体字，都是我标出的。

3 详见谭宗级：《〈五·一六通知〉剖析》，《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页、第30—32页。

4 1998年王光美对采访者的谈话，详见《香港传真》杂志2008年第6期，2008年1月16日出版。

5 引自方正等著：《青春的浩劫》第28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6 【英】麦克法夸尔著、魏海生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1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 何载：《我给毛主席当秘书》，见1996年1月5日《作家文摘》。

8 见阎长贵：《秘书田家英为何吊死在毛泽东藏书室？触犯最大忌讳》，《同舟共进》（广州）2011年第11期。

9 见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余毒》，《党史文苑》2005年第21期。

10 （汉）王符：《潜夫论》卷十《叙录》。

- 1 1 朱元璋：《鬼神有无论》，《明太祖集》卷十。
- 1 2 朱元璋：《大诰·君臣同游第一》，《全明文》卷二十九。
- 1 3 详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 1 4 详见：《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
- 1 5 详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六“中书”条。
- 1 6 详见：《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 1 7 《宋书》卷九十四《恩幸传》。
- 1 8 详见：《魏书》卷八十五《温子升传》。
- 1 9 （唐）魏征：《论治道疏》，《全唐文》卷一三九。
- 2 0 《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三》：“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为真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使乱臣贼子递相承袭，以为窃取大物之渐，非所以昭德塞违，明示百官也。”
- 2 1 详见：拙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第一编《概论》第四节《中国皇权社会及其文化体系在结构方式上的高度成熟》、拙著《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写作缘起”第三节《“走出历史三峡”与解析“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

□ 来源：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文革篇·“制度硬件”之探讨

~~~~~  
【铁窗生涯】

狱中杂记（中）

· 马云龙 ·

（上接 z k 1 8 0 7 b）

◇ 馒头的魔力

有个人物在前几篇中我已经多次提到，现在该正式介绍一下了，那就是“资深犯人”、“投机倒把犯”韩拴紧。

说他“资深”，是因为他在许昌县看守所关押的时间之长，仅次于曾“打了毛主席三巴掌”的寇学书和“日本特务”加“右派”的田忆秋，那两位都是1966年“文革”开始就进来的，名列状元和榜眼；而韩拴紧是1970年在“一打三反”中进来的，名列探花。到1979年我出狱时，他还在那里，已经住了9年。

有人作过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即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有过大大小小共计56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两次多。而“一打三反”就是“文革”期间的一次较大的运动，可与“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并列，均有全国性的影响。

说来令人感叹，为写这篇文章，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还记得“一打三反”是什么吗？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困惑地摇摇头，这很正常；但是曾经亲历过这次运动的老年人，包括曾在这次运动中挨过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能把“一打三反”的内容说完整，这有点令人意外。

上网搜索一下，你就可以查到，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把“反革命”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铺张浪费”放在一个勺里烩，从逻辑上确实有点混乱，难怪人们很难记住。

其实在一般人的记忆中，这次运动的主题就是“一打”，全国各地在这个运动中打出了多少个“反革命”，其中又杀了多少人，这一直没有个权威的说法。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中说：“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10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但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些数字持怀疑态度。人们只记得，一些“文革”中重要的思想犯就是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杀害的，例如《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

“一打”之外的“三反”，当时就很少被人提及，事后更没人记忆，没听说当时打出了哪些重要的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和铺张浪费犯。而这个韩拴紧，正好是“三反”对象之一的“投机倒把犯”，颇有点历史文物价值，这个罕见的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1975年4月中旬从长葛县看守所被转押到许昌县看守所后，他是第一个和我同号的“狱友”。从此和我关在一个监号的时间长达三年多。

见面后他自我介绍，是豫西鲁山县的农民。我问他为什么叫“拴紧”这么个怪名字，他说是山里人的风俗，意思是养个男孩不容易，要把命拴得紧紧的，防止夭折。但没想到他却紧紧地拴到看守所里了——说到这里他自己都笑起来。

当时他已将近五十岁，五短身材，筋肉强健，是典型的山里人。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目光闪烁，透着精明。当时他已有五年“狱龄”，对看守所的上上下下十分熟悉，从所长、看守、警卫到在押犯，都能指名道姓，说出个一二三，是狱中的“活字典”。我很快就发现，他在这里受到特殊待遇，经常被提出监号，到狱中伙房去“帮厨”，和伙夫老高、老刘混得很熟。他还有机会每月被押着到街上的粮店去拉粮食，回来就大讲街头见闻，让其他犯人十分羡慕。他消息十分灵通，我对看守所的大部分知识和信息都来自于他。

时间长了，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负有监视我这个“政治犯”的使命。但他说，只要我对得起他，他是不会加害于我的。看着他诡异的笑容，我明白这是个得罪不得的人物。

我这个识字人对他还有用处。除了每个月家属来送日用品时，我替他写写家信之外，他受到审讯后还曾让我帮他写交待材料，由他口授，让我代笔，他说，不读书认字是他最大的缺憾。材料写完，他像阿Q一样在上面画个圈，按上指印。由此我才得以知道了他的“罪状”。

他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犯”，而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对这一罪名的解释是：“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韩拴紧就是犯了这个“天条”——他投机倒卖的是渔网线。

鲁山是伏牛山深处的贫困县，原本没有渔业，因此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从来没有被列入供应渔网线的计划。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这里在沙河上下陆续建起了昭平台水库和白龟山水库，规模不小，因此当地逐渐产生了养殖渔业，有了对编织渔网的原料的需求。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僵死的计划经济不承认山区县对渔用物资的需求，水库区的生产队和农民偏偏得不到渔网线的计划供应。

韩拴紧这个山里的文盲，却有商业头脑，他居然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于是他从伏牛山区跑到了沿海渔业区，北到秦皇岛，南到江浙，到处去套购渔网线，然后乘火车背到鲁山的水库区，卖给库区的生产队。据他说，一次用编织袋就能背回来百十斤。这些货十分抢手，出售的价格是收购时的十几倍，平均每趟都能赚几千元，最高的一趟曾赚过上万元。这使他成了那个时代远近闻名的暴发户。要知道，当时“人民公社”的守法社员，凭工分一年也只能分到百十元啊。

从沿海渔区套购计划供应的生产资料，再长途贩运到河南山区，这在当时可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再加上他成千上万地赚钱，在那个养鸡卖蛋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当然是太引人注目了。所以，“一打三反”运动一来，他就成了许昌地区（当时平顶山市还没建立，鲁山还属许昌地区）的“投机倒把”典型。

至于他为什么在押多年，却一直没被判刑，他自己的解释是，恐怕到异地取证太难了。他在沿海渔区套购计划物资，靠的是和当地许多生产队建立了关系，出了事没人认账，鲁山和许昌的公安办案人员审了他好多次，又到沿海跑了好多趟，可总拿不到有效的证据，于是他就在看守所里“沉底”了。

监牢还真是个特殊的大学校，听韩拴紧讲他的发财经，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体制外社会经济暗流，是我这个知识分子闻所未闻的领域。但和这样一个人同住一个监号，在佩服他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冒险精神的同时，又要天天领教他那令人齿寒的奸商诡计和贪婪，对我来说也是个特殊的体验。

我前面讲过他曾用卫生纸向裴和阳换馒头的故事，那并不是他惟一的恶行，只是他在铁窗下施展商业天才的一个例子。当他痛骂裴和阳是“傻X”时，他看到的只是“商机”。吃着用一张张卫生纸换来的馒头，看着那个孩子饿得一天天消瘦，他并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和内疚，反而露出令人厌恶的得意之色，他的冷血曾让我感到恐怖。

我曾亲见他两个馒头从一个姓邵的郑州知青那里换到一件崭新的开司米毛衣，过后不久又见他这件毛衣从一个没有冬衣的犯人手中换回八个馒头。在饥饿的铁窗下，馒头是最有价值的“硬通货”，是狱中的“软黄金”。这位商业天才把馒头的魔力演绎到了极致。

有一次他被叫出去到预审股打扫卫生，回来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烟头，这在狱中可是稀罕物，看守所有严格的规定，禁止犯人吸烟。入狱时要搜身，香烟和火柴、打火机一律没收，家属来送日用品时，也禁止送卷烟和食品。同号的犯人们见到这久违的香烟屁股都兴奋起来了，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看着他。

而韩拴紧却不动声色，默默地把烟头捻碎，再用玻璃片把竹筷子刮成细丝当填充料，和烟末混在一起，把报纸撕成条，卷成了五、六根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然后，他严肃地向大家宣布：一个馒头换一根烟，谁要？

好一阵子沉默，人们都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有人经不住这巨大的诱惑，低声说出：“我要一根。”接着，又有几个人报名了。

这时，有人突然提出了问题：“有烟了，可火呢？”
人们面面相觑，傻眼了。

韩拴紧冷然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管烟，当然也管火了。不过，得有一个人到门口放哨，哨兵过来就咳嗽一声。”

接着，在人们的注目之下，他开始取火了……

小时候上学时，我曾经听说过古人能“钻木取火”，可牢房里哪有这样的工具呢？我好奇地看着。

只见韩拴紧从铺在地上的苇席上抽出几根苇篾，又从被子里掏出一团棉花，用棉花包住苇篾，再用从被子上扯下的棉线捆紧，然后放在水泥地上，用鞋底压住，急速地摩擦起来。不一会，一股焦糊的气味蹿起，只见棉条冒出青烟来，这时，他猛地停止了摩擦，抓起棉条从中撕断，同时用嘴向断裂处使劲地吹气——棉条上居然冒出了火焰！

人们围上去，贪婪地吸起烟来……

这天中午，开饭时韩拴紧把五个馒头一把抓起，自顾自地饕餮而食，那几个刚过了烟瘾的人只好用一碗清汤来充饥了。

这时，韩拴紧才说，这种取火的方法是他几年前刚入狱时从老犯人那里学来的。据说，这个秘方在监狱里已经传了几十年了……

韩拴紧不愧是个老江湖，他从别人嘴边夺馒头的手段可多着呢。

1975年夏天，号里进来了个省建公司的建筑工人，姓苏，魁梧高大，身高一米八多。他把从外面找来的情人带回家，和他老婆一起同床共枕，现在的网络语言管这叫做“三P”，当时可没这个词，只叫“流氓犯”。审讯中他没有好好交代罪行，惹恼了办案人员，给他上了“背铐”——用手铐把双手铐在背后，白天黑夜都不放松，吃饭解手都要靠别人帮忙，这可不是个好受的刑罚。

一连几天，姓苏的实在受不了啦，不断讨饶，可看守所就是不给他解除背铐，只说要等办案人员来了才能决定。

这时，韩拴紧悄悄地说话了：白天哨兵不断巡逻，你只有戴着了，但我有办法在晚上睡觉时给你解开，但有个条件：解开一次给我一个馒头，好吗？

姓苏的喜出望外，满口答应。

晚上九点哨子一响，犯人就可以躺倒睡觉了。这时，韩拴紧凑过去，先用被单盖住苏某的身体，然后在被单下开始“作业”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把手铐给摘下来了。苏某安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韩拴紧再帮他戴上。

人们都很奇怪，这个老家伙可真神了，居然能不用钥匙就开手铐！

反复追问之下，韩拴紧终于说出了秘密：其实就用一根席子篾。那种手铐是靠两排铜牙咬合的，只能紧不能松，先拿一根席篾插进去，然后紧一扣，同时让席篾夹在上下牙之间，使上下牙不能咬合，接着朝反方向一抽，那排活动的齿牙就顺着席篾滑出来了。

他说，这也是他在狱中向老犯人学到的小技术。

这以后，苏某又戴了半个多月的“背铐”，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由韩拴紧帮他摘下，清早再戴上，居然一直没有被发现。而韩拴紧的收获是每天多吃一个馒头——还有一个交易的副产品：姓苏的必须把自己流氓犯罪的经过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讲清楚，韩拴紧和其他犯人听得津津有味……

我在狱中有一条军绿色的毛毯，韩拴紧早就看中了，多次提出要用馒头和我交换，我一直没答应。直到1979年1月，我突然被释放了。在办完出狱手续后，我被允许回监号去收拾自己的东西。韩拴紧看到我要走了，热情地上来帮我整理铺盖、衣物和书籍，同时悄悄地哀求我：“那毛毯给我留下吧。”我想了想，就把毛毯扔到一边了，我看到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后来问法院的人，他们说，平反冤假错案，肯定不包括那个时代的“投机倒把犯”。尽管后来商业大潮涌动，全民经商成风，“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的罪名没有了，但“现在有现在的法律，那时有那时的政策”，“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啊……

这些年我经常想，此人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晚十年，放到1980年以后，他说不定还真能成为一个商海的弄潮儿呢。假如有人告诉我，韩拴紧如今已经成了个风光八面的千万富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人家有这个素质啊……

（未完待续）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 【劫后反思】

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读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有感

• 唐 燕 •

何方老《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一文阐述了：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社会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世界已从“战争与革命”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并且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了国策，从而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用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仍固守着战争与革命的理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各种政治运动代替经济建设，用闭关锁国取代对外交流，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代替搞缓和；甚至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的持久战”消灭帝修反；更在中共九大报告中错误地定位为当时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和

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各方面丧失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期。

何老的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对我们红卫兵知青一代是怎样成了暴力革命信徒的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由于对时代的误判被扭曲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即效仿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1958年起始的教育大革命，又一改读经、国学、修身、人文、西学等等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内容，“把阶级斗争作为我们的主课”，使教育完全从属于政治，丧失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阶级斗争理论无视生产要素的多元性和资本存在的合法性，无视只有当资本为劳动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时劳动才为资本的增值提供了可能，认定只有劳动者才创造了价值，而财富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只是无偿占有了社会财富。结果贫富成了评判善恶的标准，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价值观。

阶级斗争理论无视每个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群体都有自由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权利，其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不应通过阶级斗争，而应靠制定相关的法律并严格遵守。

阶级斗争理论还无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并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人权，任何公民都既没有压迫他人的权力，也没有受压迫的理由。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却仍体制性、政策性地吧国民分成三六九等，并煽动阶级仇恨，继续大搞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理论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仍要使用暴力。结果把对“坏人坏事”施暴视为理所应当，不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和指导下，我们红卫兵知青一代从小就推崇革命，以革命为理想、为崇高、为人生目的；向往打仗、崇拜英雄，以没能生长在战争年代，没有当英雄的机遇而遗憾。我们把一切事物贴上阶级的标签，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看作阶级斗争，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根本没有仁爱、宽恕、妥协、合作等理念，只有对立、冲突、仇恨和斗争。结果我们失去了善良的本性，张扬了暴戾的人性，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我们不仅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被教导：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必将打出一个在全球实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于是我们庆幸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更天天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以便加入解放全人类的英勇战斗，并随时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以及毛泽东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式。

那时我们不可能认识到“战争与革命”不仅和人道、人权、人的生命这些崇高的观念相抵触，还同独断专行、无视法律、剥夺人民自由和私人空间的极权主义密切相关。更不懂得爱国主义可能成为专制的重要手段而值得警惕，因为专制下的爱国主义不仅夸大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仇外排外，还把统治者视为国家的化身和偶像。

在个人崇拜的迷醉中，我们相信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所以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我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敌视西方民主国家，对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你死我活不可调和。我们不知道在那些不以阶级斗争理念和方式治理的国家，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文革开始后，我们批判殴打代表资产阶级的校长和老师、斗争地富反坏右、抄家游街破四旧、砸烂封资修、打倒帝修反……文革这个“盛大的节日”给我们提供了当英雄的广阔舞台，终于为我们弥补了没有机会干革命的缺憾，也加剧了我们人性的恶变。

那时我们不仅在国内很风光很疯狂，而且大串联后在越南、缅甸等邻国也出现了我们的身影。我们豪情满怀，激情万丈，一心要投身世界革命，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插遍全球。

北京滑翔学校的赵建军和北航附中的李小倩等10名红卫兵从1966年9月起就开始学习越南语、到昆明湖训练游泳……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后成功偷越中越边境，并于11月12日在越南入伍投入了援越战争。赵建军在给他爸爸妈妈的信中说：“我不愿意在温暖的暖房里虚度年华，我的父母都是革命者，作为你们的后代，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有责任而且也必须走你们走过的路，到部队去到战火中去，这样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放心吧，你们的儿子不会给你们丢脸的。”他24次请战要求到阵地最前沿，两个月后的1967年1月19日他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中，牺牲在自己的炮手岗位上。

1967年1月23日北京和桂林的27名男女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后来被周恩来特批为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战士。

此外，1966到1968年间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红卫兵或越境失败，或被在越南的我军劝送回国。

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们许多人争先恐后要求去黑龙江和内蒙，因为那里离苏修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

从1969年起，在云南下乡的昆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知青总共一万多人参加了1968年初刚刚崛起的，被中共暗地里支援的缅共人民军。在历次战斗中，知青们总是打头阵、当先锋。他们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数以千计的知青忠骨轻抛，其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侥幸保存下来的遗体，被用绿色军用塑料布一裹，匆匆掩埋在异国的荒草丛中。

1968年夏天，北京101中66届高三老红卫兵臧平分创作的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以佚名先在北京红卫兵中流传，后来迅速传遍全国。这首诗讴歌了红卫兵战士远征欧美亚非拉后，踏上归途前在异国的陵园向“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英勇献身的战友告别时的壮烈情怀：

.....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峰巅，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踏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我们曾利用过耶路撒冷的哭墙，  
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  
将红旗插在  
苏伊士河畔。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重任在肩！  
.....

这是最后的斗争，  
人类命运的决战  
就在今天！  
.....

毛泽东的教导，  
伊里奇的遗言，  
马克思的预见，  
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

与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政治幻想诗相对照的，是北京四中 67 届高二学生张育海写给友人的，后经刘杰传抄，在各地知青中广为传阅的长信。

张育海1968年10月去云南下乡，1969年3月加入缅共人民军。本来他被安排在营里当文书，但他坚决要求下连队当了机枪手。1969年6月21日张育海战死在金三角。这封他在牺牲前19天写给友人的信道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浸润下，这位高才生对毛泽东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的丰富联想、以投身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壮怀心志、对战争残酷性危险性的“冷静的认识”，以及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坚强决心。信的后半部分如下：

历史的经验证明，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由不断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不是当年拿破仑，那属于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完全不同阶级内容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指明这一点，在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永远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要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的，不是没有机会投身历史浪潮，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得，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他自己说的话）“不是幸福特别照顾他，而是幸运抬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如果能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思想，就会不怕环境的艰辛，而别人颓废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吧，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时，谁又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我走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的生活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而博“一次”、“跳”一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暗淡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怕艰险而锻炼直上的“战士”。对于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儿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人的惨剧。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和刮风下雨一样，不管你是否喜欢，而自然要来的，是人类解放必须的。当然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地去想，战争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和兵力计较上有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而是说人的价值），为战争整个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而为了战争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什么援兵，肯定要守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是家常便饭，塔山阻击战呀，上甘岭战役呀，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缓冲阻击战呀，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比比皆是，朝鲜战争初期之比是一：七，我伤之七，美伤之一（后期相等，后为七：一），有时几个军被消灭的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的认识。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一颗子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或激战中冲上去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枪，连敌人还没见到就完了也不少。打打仗的时候，有时一个班，一个排为通过封锁线而全部报销的也有，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冷冰冰的地上，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为后方医院来不及治，流血过多，经长期的痛苦和挣扎，头脑清醒地死去。古诗中“谁知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惨凄悲戚之外，即在



于此。学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学生，有很多抱负很大，看不清，在心里存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牺牲时（不是我们平时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么办呢？另外，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字，无论多危险，要冲就得冲，无论你是否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得冲，你累？你病？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你这样，环境逼得你这样，否则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要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致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没有缓冲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利，只有干到底，不论路多长。我现在停在战区的战场，横观世界，竖看历史，是最舒服的。战争发展起来，定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有些人要停战了。在云南短短的战斗，对生活影响就极大，莫要说那么遥遥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刘杰就不行了，我有冠心病不是也干了。但有两点：一要珍惜和平的幸福，例如不至会饿饭，半夜不必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泥泞爬山路，不必雨中住山头等。二不要以玫瑰色眼光看待战争，××北京入伍，还没有到战斗单位就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的太不容易了！朋友中大概大伟（唐燕注：沈大伟，北京四中66届高三学生，1969年从他下乡的山西追随张育海参加了缅共人民军，1970年5月24日在战斗中牺牲）、任杰最合适了，而××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一次叮咛勿冒失，这儿走错了不比国内，我们的身份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定的，众说纷纭，这本来是件悄悄的事现在大张旗鼓，反叫中央为难，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公开承认。所以不要冒失！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保重，不轻易挺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是有其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请转看，我毫无顾虑！

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安康

育海1969·6·2

1970年12月缅共人民军里的知青官兵们尴尬地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外交关系有了恢复的迹象。

之后，那些陆续回国的知青们再次尴尬地发现，他们被要求：对自己这段为世界革命出生入死的光荣经历要“忍辱负重，不能说”。更有甚者，因为当年他们是自愿对外输出革命，按规定属于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丧失了国籍的他们由于在国内很难生存，有些只得再次返缅，重又参加了缅共人民军演变成的金三角地方武装，有的则靠在缅种罂粟为生。

直到1980年中国政府才出台了接纳他们回国的政策。然而，他们青春已逝，更错过了知青招工、招生、考大学等等的重大人生机会。

曾在缅共人民军身经百战，负伤四次的原昆明知青、现任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土地局局长的谢斌回顾过去时说：“一个国家的革命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靠革命输出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我们来说，体会就深一点儿。”

如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数十年来，虽然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纷争不断，但双方都只是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直到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爆发，使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得以大发展。

二战遗留的朝鲜和越南南北分治问题长期未得解决是美苏争霸的结果，刚刚成立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却不仅没与苏、美拉开距离，还义不容辞地投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果白白牺牲了我们数十万解放军官兵，损耗了两千亿美元，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恶化了我国的周边局势，将我们置于美国和西方的对立面，更使我国失去了二战同盟国地位，没能享受二战的胜利果实，反遭数十年的封锁和禁运。

六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教育了曾是暴力革命信徒、以解放全人类为神圣使命的我们：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我们不应把各国对制度和道路的不同选择作为判别敌我的标准，更不应与之势不两立甚至诉诸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惨痛的教训，尽力避免不计后果的世界大战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各国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追求和努力对霸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已形成越来越大的遏制力量，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正是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也同样得益于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界早已步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并抓紧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今后，我们应严格奉行普适价值这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进一步融入文明世界，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固，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作者简介：唐燕，女，1950年出生，中学老三届，大学新三届。1968年从北京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七炭板村插队。1969年起在七炭板村小学，察素齐、呼和浩特市、河北省廊坊市、北京市中学任教。后移民加拿大，现在中加两地居住。）

□ 原载《记忆》第216期

~~~~~

【编者启事】

本刊zk1807b（《文革博物馆通讯》966期）（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出版）所刊“毛泽东在林彪出走的那些日子里”一文仅注明作者陈长江，未注明舒云整理，也未注明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七期。特此更正，并向舒云致歉。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